本版编辑：史小今
E-mail：m2@studytimes.cn
Tel：010—62804757

从桑德斯现象看美国左翼民粹主义运动

□ 周　琪　付随鑫

在2016年的美国大选中，出现了“特朗普现象”和“桑德斯现象”。两种现象相伴而生，令人对美国社会的现状产生了疑问：究竟是什么因素导致意识形态、政策主张、个人风格迥然不同的两个人，都在此次大选中受到民众的热烈追捧？

特立独行的民主社会主义者

桑德斯是当今美国政坛上少见的特立独行者。他1941年出生于纽约市的布鲁克林，毕业于芝加哥大学，20世纪60年代曾积极参加和组织民权运动，并多次被捕。70年代后，他在美国东北部小州佛蒙特投身于政坛，曾在长达36年的时间里，以独立人士身份先后当选市长、联邦众议员和参议员。由于他的立场更接近民主党，他在国会里往往追随民主党的投票立场。2015年4月30日，桑德斯宣布将角逐民主党总统提名，但直到当年11月他才正式加入民主党。

桑德斯的意识形态在美国也是非常独特的。他一直以民主社会主义者自居，希望将美国建设成瑞典、芬兰那样的北欧福利国家，因此他可以被视为民主党中的极左翼。虽然美国主流社会仍然厌恶社会主义，但桑德斯却明确亮出其民主社会主义者的身份参加总统选举。这在美国两大党总统竞选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桑德斯还自称是犹太教徒，他也因此开创了两大党历史上非基督徒首次赢得一州初选的记录。

桑德斯的民主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鲜明地体现在他的政策选择中。他是支持2011年“占领华尔街”运动的极少数政治家之一。在2016年的竞选中，他声称其目的是要通过积聚草根力量，在美国掀起一场“政治革命”。桑德斯提出了一整套激进的政治纲领：希望建立一套覆盖所有人的、由联邦政府单独支付的医疗保险体系，拆解华尔街的大银行，加强对大企业和跨国公司的监管，对富人和企业大幅度增税，取消公立大学的学费，将联邦最低工资从当前的7.25美元/小时提高到15美元/小时，实施带薪产假，缩短非法移民的归化时间，对污染企业征收碳税，禁止采用压裂法开采天然气，反对自由贸易和TPP等区域贸易协定，反对美国发动海外军事干预，等等。

桑德斯的观念与当前民主党以及美国主流社会的偏好大相径庭。已有不少专家论证说，桑德斯所主张的全民医保、大幅度增税、公立大学免费等政策，在美国当前的政治经济环境中几乎是完全不可行的。虽然以希拉里和奥巴马为代表的民主党建制派都试图加强对华尔街的管制，但他们与华尔街的关系都很密切，绝无可能拆解大银行。民主党建制派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支持自由贸易和海外军事干预。民主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在民主党精英中也遭到普遍排斥。桑德斯至今只得到8位民主党联邦众议员和1位联邦参议员的支持，仅相当于希拉里的零头，就是一个例证。他甚至被许多民主党精英贬斥为假民主党人。

引领美国的左翼民粹主义运动

桑德斯虽然不受民主党建制派的青睐，但他拥有大批坚定的草根支持者。这些人主要是年轻人，其次是中下层白人。根据盖洛普对民主党认同者的调查，低于30岁的人中有62%的人支持桑德斯，只有35%的人支持希拉里。同时，高达61%的白人支持桑德斯，不过只有36%的黑人和37%的拉美裔支持他。在当今美国，年轻人面临的问题是沉重的学费、大学贷款和就业压力，而中下层白人面临的问题是就业机会的消失、经济社会地位的下降以及严重的焦虑感。这些人的意识形态比民主党整体更加自由化，也更加关注经济不平等。桑德斯为他们提供了一整套左翼民粹主义的解决方案。

从这个意义上讲，桑德斯引领着当今美国的左翼民粹主义运动。民粹主义在美国历史上时常出现。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民粹主义，其核心特征都是崇拜人民和反对精英。桑德斯号召人民行动起来进行反对权势阶层，特别是反对富人、大企业和腐败的政治精英。2011年爆发的以“99%反对1%”为口号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可以说是桑德斯竞选的一场预演。美国的左翼民粹主义往往带有社会主义色彩，桑德斯的竞选也不例外。

桑德斯试图通过积聚草根力量来迫使民主党继续左转，从而在美国实现民主社会主义的“政治革命”。他猛烈攻击民主党建制派，谴责他们被华尔街的金钱以及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所腐蚀。桑德斯的竞选也主要依靠个人小额捐款，其总额不仅远超过希拉里，而且打破了奥巴马在2008年创造的纪录。

桑德斯的左翼民粹主义与特朗普的右翼民粹主义虽然在意识形态上大相径庭，但也表现出许多相似之处。例如，两人都是美国主流政治的局外人，都激烈攻击两党建制派，都得到大批中下层白人的支持，都反对金钱政治和华尔街，都拒绝自由贸易和区域贸易协定，都反对美国的海外军事干预，等等。左右翼民粹主义在此次选举中出人意料的兴起，表明美国遭遇到了严重的经济社会危机。

左翼民粹主义运动兴起的原因

以桑德斯为代表的左翼民粹主义运动和以特朗普为代表的右翼民粹主义运动的出现，实际上根源于同样的社会和政治因素。首先是美国存在的严重经济不平等。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进入“新镀金时代”，经济不平等程度重攀历史高峰。2014年美国基尼系数已经高达0.48，这不仅远超过0.4的警戒线，而且在发达国家中是最高的。收入和财富越来越集中在一小撮人手中，目前美国最富有的0.1%的家庭所占有的财富与中下层90%的家庭几乎相等。经济不平等增强了富人对政治的影响力，从而引致中下阶层对特权阶层的强烈不满。

在这次选举中，桑德斯的矛头主要是指向美国日益加剧的经济不平等现象，希拉里将其描述为单一议题候选人。桑德斯认为贫富分化主要是经济全球化、华尔街金融势力及其所收买的腐败的政治精英所造成的。美国的年轻人曾在2008年热烈拥护奥巴马，但奥巴马并未兑现其在竞选中所许诺的政治变革，相反却越来越趋于妥协，在解决经济不平等问题上采取的措施也非常有限。因此，在今年的选举中，美国年轻人抛弃了奥巴马所支持的希拉里，转而支持立场更左的桑德斯。而美国中下层白人由于受到全球化、自由贸易和技术进步的威胁，经济与社会地位不断下降，自身规模也在逐年缩减，因此他们站出来支持桑德斯的全民福利、贸易保护主义等民粹主义主张。

最近40余年里美国的政治极化愈演愈烈，导致两党政治陷入严重的僵局。民众对政府和政客的信任度已经降到二战以来的最低点，对两党建制派的不满与愤怒也不可抑制地爆发出来。这为民粹主义运动的兴起提供了丰富的土壤。桑德斯正是借此大胆突破了美国的政治传统，直言不讳地宣传民主社会主义的主张。

桑德斯的世界主义观念也反映了不少美国人对美国特性的重新认知。在经历十年反恐战争、美国实力与国际地位相对下降的情况下，许多美国人对战争和海外干预变得非常反感。他们不再坚持“美国例外论”的传统观念，反而希望美国进一步融入国际社会，遵守国际规则，变得更像某些其他国家。

桑德斯对美国主流政治的挑战产生的影响

桑德斯对美国主流政治的挑战并非主要表现在选举结果上。尽管他消耗了希拉里许多本可以用以对付共和党的金钱和时间，但他对希拉里的挑战仍然明显小于2008年希拉里对奥巴马的挑战。在最终选举中，桑德斯很可能会为希拉里站台，毕竟特朗普的当选更不能令他接受。

虽然桑德斯不可能在与希拉里的竞争中获胜，但他已经显著地影响了民主党，也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自己的期望。桑德斯的直接影响是迫使希拉里和民主党建制派接受其部分主张，特别是在TPP协议、管制华尔街、联邦最低工资、贸易保护、环保政策等方面。在提名无望的情况下，桑德斯依然宣称要将初选进行到底，其主要目的就是迫使7月份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进一步接受他的主张。

就长期影响而言，桑德斯以民主社会主义者的身份参加民主党的初选，使得社会主义这个在美国敏感的词很大程度上“脱敏”了。相对于主流社会，美国的年轻人对社会主义持更加积极的评价。随着年轻人越来越涉足政治，桑德斯开创的新政治联盟在未来还可能产生更大的影响。从这个角度讲，民主党可能会在这股力量的推动下继续左转。

另一个重要影响是，此次大选中的民粹主义运动使得经济不平等、全球化等重大问题愈加突显出来。桑德斯成功地将这些左翼议题带入主流政治议程中，使它们成为今后不可回避的长期问题。这些议题也将成为美国左翼政治运动在未来持续下去的重要推动力。

然而，桑德斯的“政治革命”仍面临巨大的阻碍。民主党的主流依然遵从美国的政治传统，不接受桑德斯的过左立场，特别是少数族裔这个民主党的核心选民群体对桑德斯的号召并没有做出积极回应。桑德斯的主张看上去更有利于中下层民众，但大量贫困选民要么不投票，要么投票支持希拉里，以致桑德斯将自己的失败很大程度上归因于穷人对选举不热心。美国的左翼运动要想动员起足够大的政治变革力量，前途并不乐观。而且，桑德斯的左翼民粹主义运动虽然提出了不少重大议题，却没能给出多少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这也不能使美国广大选民从中看到希望。

环球瞭望

缓解叙利亚危机 应避免单边干涉

□ 李子昕

近日，美国高层官员及五角大楼纷纷表态，指美国有意向伊拉克和叙利亚边境地区派出更多军事力量以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作为国际公认的恐怖组织，“伊斯兰国”自兴起以来，给中东乃至世界多地带来了严重的安全威胁，一系列恐怖袭击事件造成大量人员和财产损失。打击恐怖主义是国际社会共有的义务和责任。然而，缺乏协调与共识的单边军事行动，往往非但达不到良好预期目标，还会导致局势进一步恶化。

自2014年8月8日对“伊斯兰国”展开空袭开始，到2016年3月底，美国用于应对“伊斯兰国”的军事行动共耗资70亿美元，平均每天1160万美元（约合7540万人民币）。不仅美国，其一众盟友也是投入甚多。然而，耗资不菲的军事行动却并未带来有效的打击效果。更令人费解的是，美国总统奥巴马不止一次表态：“我们尚未有打击伊斯兰国的有效战略。”计划未有而行动先行，盲目的打击只是针对“伊斯兰国”一个个单一军事目标，极端组织用极低的成本消耗着国际社会高昂的财力物力，更使地区安全局势愈发恶化。新月沃地沦为一片焦土，所到之处生灵涂炭。这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单发式”军事打击并不能真正解决叙利亚、伊拉克的恐怖主义威胁，更不能为地区带来持久的和平。相反，由于大量武力的投入以及对地区代理人疏于分别的盲目资助，造成地区内部角力复杂化，不同派别间的敌我划分愈发模糊，擦枪走火所引发的不必要军事冲突风险激增，为极端组织在本地区的存活乃至蔓延提供了空间和土壤。

智库“欧洲领导特别小组”（European Leadership Task Force）近日发表报告称，根据联合国叙利亚独立国际调查委员会的最新报告，叙内战已经演变成“一场由错综复杂的联盟网络从海外操纵的、有多方参与的代理人战争”。“一场意外、一个军事事件或者一项未经授权的行动便可能引发一场冲突，尤其是在缺乏有效沟通渠道的情况下”。事实上，去年11月土耳其击落一架俄罗斯战机的事件已经表明，在参与叙境内军事行动的各方间，发生直接对抗不再是不可想象的事。该事件曾造成了严重外交后果，在国际社会的强力斡旋下才终未产生军事冲突。如若类似的事件再次发生，其代价可能是灾难性的。

叙利亚内战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政府军、武装反对派、极端主义、恐怖主义等各派势力相互交织，加上错综复杂的教派冲突与民族对立，使“敌人的敌人便是盟友”的旧律不再适用于当下的叙利亚冲突中。如今，美国等西方国家出于各方面考量不愿派遣地面部队前往战区，必须通过扶植当地代理人以达到预期目标。不同于在伊拉克同政府军展开合作，在鱼龙混杂的叙利亚选择既反对政府又反对极端主义的合适代理人则异常困难。当下叙利亚内部许多派别都有“借力打力”的小算盘，敌我关系不以道义为区分，却靠短期利益为纽带。极端主义凭借着反阿萨德政府的旗帜，在叙内战的混战中谋得生存的空间。

若要有效打击恐怖主义势力，则必须铲除为短期利益而与极端分子媾和的行径。为此，国际社会曾就“甄别叙境内恐怖组织”的重要性达成共识。然而，出于不同的立场与标准，至今尚未有各方一致认可的甄别体系。这就使得地区国家和域外大国在介入叙利亚事务，特别是给予军援或展开军事行动之时，常因选择不同的代理人而引发叙国内各派势力及外部国家间诸多矛盾与不满。这些对立正是“伊斯兰国”等极端主义组织所希望看到的。

叙利亚问题日内瓦和谈第二阶段会议已于4月27日结束，新一阶段和谈尚未展开。在各方尚未就新一轮谈判做好准备之时，最关键的是认真落实既已达成的各项谈判成果，争取实现更大范围内的停火，为局势降温，并为政治解决叙利亚问题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增加军事投入，武力干涉改变各方力量对比的做法将不可避免地引发新的猜忌和对抗，无助从根源解决叙利亚问题。

近期，美国国务卿克里表态为叙利亚总统巴沙尔交权发出最后通牒，声称8月前巴沙尔不放弃权力，美国则会“采取其他办法终结长达5年的叙利亚内战”。这样的警告看似严厉，但实则仅是空言恫吓。美国大选两党候选人初选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无论是哪位候选人对于中东政策均未提出清晰且可行的“未来方案”。原因无外乎中东局势高度复杂和敏感，即便如美国这样的强国，直接干涉叙利亚局势会产生何等效果仍难以预计。而当前的奥巴马政府，在任期只剩半年的情况下更不会采取任何激烈手段而为自己总统任期的“圆满结束”增添新变数。当下的叙利亚局势需要各方回归冷静，在联合国“路线图”框架下从停火止暴做起，展开全方位对话，进而谋求通过政治谈判解决危机。无意义地以“武力干涉”进行威胁，只能起到破坏和谈氛围的消极作用。

事实上，关于解决叙利亚问题，王毅部长早已给出“中国方案”：第一，各方应充分尊重并遵循联合国框架，严格执行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的有关决议，无论遇到什么情况，都应坚持政治解决的大方向。第二，叙利亚国内各方应以民生为重，以叙利亚百姓利益为重，克服困难尽快复谈，叙利亚的前途命运应由叙人民自己决定。第三，地区内主要国家，特别是对叙利亚局势有重要影响的地区国家，应多从止暴抑暴的角度出发，停止相互指责，减缓教派冲突与地缘争夺，为即将实施的停火止暴和人道救援发挥建设性作用，而不是相反，更不能扯后腿。第四，域外国家，特别是在国际社会有重要影响力的大国，应以地区和平为重，切实承担起应有的责任，为落实联合国相关决议发挥应有作用，为叙利亚问题政治解决提供必要的外部环境。

叙利亚的战火已燃烧五年，无数难民流离失所，恐怖组织肆意横行。在难民危机、恐怖主义危机不断外溢的当下，国际社会须检讨曾经的单边干涉政策，重新回归联合国等多边合作的轨道上来。摒弃动辄盲目开展军事行动或军援，激化地区武装冲突不断升级的行为，为叙内部有关各方摒弃前嫌开展政治对话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只有叙利亚内部达成谅解，才有可能与国际社会一道共同应对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等恐怖主义势力，地区安全才有重回和平的曙光。

时　评

有效管控中日海上军事危机

□ 慕小明

日本于3月29日起正式实施新安保法。在近年中日之间海上局势相对紧张的背景下，新安保法将对中日之间的海上博弈产生何种影响，中日之间是否能够有效管控海上危机？值得我们密切关注和思考。

打造东海西南诸岛防卫要塞

在东海方向，日本主要强化以钓鱼岛守备力量为核心的西南诸岛防卫力量。1月31日，航空自卫队将福冈的一个飞行队调往那霸基地，与冲绳县那霸基地的战斗机部队合并升格为第9航空团，这是日本50年来首次组建新的航空团。2月24日，海上保安厅负责钓鱼岛海域的第11管区增设了两艘大型巡逻船，组建完成了“钓鱼岛专门巡逻部队”。3月28日，陆上自卫队在冲绳县与那国岛部署了150人的沿岸监视部队，进一步强化了西南诸岛军事力量。4月16日，海上保安厅举行了所谓“尖阁专队体制”建成纪念仪式。该专队拥有约600名人员和包括10艘1500吨级最新型巡逻船在内的12艘巡逻船，将专门负责在钓鱼岛及周边海域执行警戒任务。巡逻船的基地位于冲绳县石垣岛，港口周围新建了码头和船舰基地、宿舍及仓库。

日本自卫队在更新军备的同时，冲绳及西南诸岛的战略部署呈现出“要塞化”的特点。加强西南诸岛的军事部署，日本毫不掩饰遏制中国的意图。从防御角度看，冲绳附近水道特别是位于宫古岛和冲绳岛之间的宫古水道，宽约260公里，是第一岛链最宽的水道，是海空力量进入西北太平洋的重要通道，如果控制了这一区域，就能有效封锁进入太平洋的通道。从进攻角度看，这一区域距离东亚大陆很近，适合作为海空进攻的前沿阵地。

常态化深度军事介入南海

新安保法通过以来，日本自卫队获得了直接介入南海的法理依据，其在南海活动愈加活跃。一是联合军演。建立了与越、菲两国的定期或不定期联合军演机制。此外，日本自卫队还可能在南海海域与美军进行联合演习。二是海上巡航或联合巡航。此前，日本自卫队在南海的巡航主要由在印度洋执行反海盗任务的舰艇编队在回国途中实施，较为“低调”。近来，日本越来越刻意强调其在南海的存在。今后，自卫队很可能从本土派遣舰艇前往南海执行巡航任务。此外，不排除未来美日、美日澳在南海进行联合巡航的可能。三是空中巡逻。目前，日本自卫队的巡逻机只是“顺道”经停越南时与越方进行联合演习，并未单独在南海执行巡逻任务。如果日本与菲律宾就日本巡逻机使用菲律宾基地事宜达成协议，海上自卫队很可能会以菲律宾为基地，定期在南海执行巡逻任务。四是战略性靠港。4月3日，海上自卫队“亲潮”号潜艇和“有明”号、“濑户雾”号驱逐舰停靠菲律宾苏比克港。这是海上自卫队潜艇15年来首次停靠菲律宾港口。五是强化与南海主权声索国军事合作。日本政府不断强化与菲律宾的防卫合作关系。去年5月，日菲在南海举行首次海上联合军演。6月，安倍晋三与阿基诺三世达成有关军事技术和装备交换的协议。安倍政府近年来还主动加强与越南的军事合作。除了今年海上自卫队军舰首次停靠金兰湾，去年9月越南领导人访问日本期间，日本更是高调炒作南海问题，并表示将向越南无偿提供二手巡逻船，帮助越方培养海上巡逻力量。

日本在南海的军事介入还存在深化的可能。如果日方舰机在南海巡逻，则必然涉及与美国的反潜协作。美日两国很可能会在南海建立类似于东海的联合反潜体系。此外，日本的巡逻情报，也很可能与菲律宾进行深度共享。

有效管控中日海上军事危机

新安保法的实施加剧了军事对抗带来的地区紧张，与主张通过对话解决问题的意愿背道而驰。目前中日在东海方向的海上维权斗争已是常态化。据日本媒体称，为监视和拦截中国军机，2015年日本自卫队在东海方向紧急出动战机的次数比2014年增加了23次，达到571次。由于日本深度介入南海事务并与南海主权声索国强化军事合作，中日在南海发生军事摩擦甚至冲突的可能性同样存在。

随着中国扩展海外利益和维护海洋主权，中国建设强大海军和迈向深蓝不可逆转。在当前中日在东海和南海战略角力常态化的背景下，建立有效的军事危机管控机制，对于我们“统筹维权和维稳两个大局”意义重大。

首先，要重视军事危机管控的地位与作用。要充分发挥军事危机管控的战略博弈和避免冲突功能，切实将军事危机管控作为实现“合作安全、综合安全、共同安全”的必要手段，维护国家主权。

其次，要健全军事危机管控机制。一方面，要努力完善我国的军事危机管控机制，明确军事危机管控的基本原则，制定应对预案，加强政策协调与落实，指导研究与总结经验。另一方面，要积极推动中日之间的军事危机管控机制建设，建立突发情况预警、军事危机预防、危机冲突管控等机制。中日之间应建立多层次的沟通渠道，制订海空行为准则及其他安全信心措施，开展危机管理对话，兼顾好维权与维稳两个大局。

再次，要加强军事危机管控能力建设。军事危机管控以实力为后盾。实力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危机的结局。苏联在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最终败下阵来，根本原因还是综合国力落后于美国。一是科学预见军事危机的能力。重点加强人工监视、情报搜集的跟踪分析，对情报资料的综合分析和危机预案的设置能力。二是依法处置军事危机的能力。2015年颁布的《国家安全法》对“危机管控”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同年发布的《中国的军事战略》国防白皮书也明确把管控危机作为国际军事安全合作的一项重要内容。这些重要文件为我们依法处置中日之间可能的军事危机，加强军事危机管控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三是深化军事危机管控理论研究。深入研究中日之间军事危机的内涵与特征，军事危机管控的原则、程序与方式，准确把握对军事危机管控的“度”，克服军事危机管控中的“盲点”和薄弱环节，进而增强“化危为机”的能力。

战略视角